

多情却被无情恼

——郁达夫两段婚恋及相关文献分析

沈小惠 高照成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工作室 杭州 311400)

摘要：本文对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和第二任妻子王映霞之间婚姻家庭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从第一手资料研究婚恋关系与其创作间的真实关联。对于原配的离弃而另寻新欢自然是郁达夫浪漫性格和执意追求理想爱情的结果。但在追求王映霞的过程中，郁达夫对于远在北京的妻儿是偶有愧疚心理的。但随着与王映霞新的家庭的组建，这种愧疚心理因经济方面的窘迫和自身心境方面的原因而逐渐淡化，直至后来完全消失。而早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郁达夫对于与王映霞的婚姻就曾表现出悔意。他们之间曾经轰动一时的爱情最终也被证明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婚恋家庭纠纷对郁达夫创作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深入分析其 1942 之前的生活与创作经历。

关键词：郁达夫；《日记九种》；孙荃；王映霞；婚恋

中图分类号：B823；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 (2022) 01-0071-06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1-071.html>

百年前的 1922 年 4 月，郁达夫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三个月后返国。作为“弱国子民”，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遭受过不少的歧视和冷眼。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文学作家，其成名作《沉沦》的发表已过百年。陈子善认为，“作为‘五四’的产儿，郁达夫的名字是与中国新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家之外，郁达夫还具有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及文学副刊主编等多重身份。1926 年年底，因对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失望透顶而返沪之后，他很快便发表了那篇揭批该政府内部腐败乱象的《广州事情》。但旋即便遭到友朋郭沫若和成仿吾的先后指责。之后，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计考虑，他又发表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和《乡村里的阶级》等一批政论性文章。

七·七事变后，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他都积极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他在南洋写过很多政论，鼓舞人民斗志，坚定侨胞必胜信念”——并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大力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色厉内荏和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最终，他因自己的这些爱国主义言行而惨遭日本宪兵的清算并被

秘密杀害。无论是作为“五·四”新文学作家、爱国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革命烈士的郁达夫都值得我们深切纪念。他的很多小说、散文、杂文、文论等也会被长期阅读下去。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自叙传”作家，郁达夫在婚恋和家庭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引起学术界的议论纷纷，特别是这些问题对他创作的影响，在其作品和书信中都有相当多的反映，也值得我们思考并探究其原因。同时王映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关于王映霞研究的论著中，更有多处涉及郁达夫。包括他在对待原配夫人孙荃及其子女问题上的态度，都引起极大关注。因此，从严肃的学术立场与文学史记史原则，都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

—

1938 年 7 月 5 日，全国的抗战正处于紧要关头。作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却出人意料地在报纸上公开发了一则寻找妻子王映霞的启事。由此，他们当初那场轰动一时的恋情就已开始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则启事包括所有的标点符号在内也只有七十来字，不妨照录如下：

作者简介：沈小惠，女，文学硕士，杭州市富阳区文联郁达夫工作室研究员。

高照成，男，山东菏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启事中的某君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的厅长许绍棣。此人为浙江 CC 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怂恿当时的浙江省党部通缉身在上海的“堕落文人鲁迅”。当月初，刚从“东战场”抗战前线视察劳军归来的郁达夫在家中发现“奸夫来信”，随即被王映霞的背叛激怒了。两人发生口角之后，王负气离家出走。郁则在羞愤难当的情况下，不计后果地将大多数男人都唯恐掩之不及的家丑公之于世。虽然王的出轨行为基本是确定的，但郁达夫却并无确凿的证据。外加友人的劝和并考虑到家中的几个孩子，郁达夫最终选择了妥协，并于五日后再次在汉口的《大公报》上登载了一则“郁达夫启事”：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误指女士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显然，这后一则声明是在友人的劝说下为维持正常的家庭关系并为王挽回面子而发的。但经过修复的感情毕竟是无法长久的，尤其是曾亲密无间的夫妻之间。虽然在该年年底他们二人携长子郁飞一起远赴了南洋，但随着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次年三月在香港《大风》第 30 期上发表，两人之间已完全失去信任并彻底走向决裂。最终他们在关楚璞的见证下于 1940 年 3 月 6 日协议离婚。这在郁达夫当年五六月份分别致戴望舒及林语堂的信中也可以得以印证。

在致戴望舒的信中，郁达夫提到：“久不通信，实因家庭纠纷不已……王女士已与弟协议离婚，两方各得自由矣。”并请其代为在香港的报纸封面上刊出一则他与王之间的婚姻解除启事并登载三天。王映霞于当年的 5 月 24 日只身离开新加坡回国，离婚启事则按计划于一周后刊出在了《星洲日报》上。简短的启事中主要公告世人：“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

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与达夫无涉。”王映霞则于此日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布启事称：“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显然，与郁达夫的告知性声明不同的是，王的启事把协议离婚的原因归咎于男方，且对其有污名化的言辞。

在 1940 年 6 月初致林语堂的信中，郁达夫亦谈及其与王氏已完全脱离关系；并“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致流为社会害虫，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云云。至此两人持续十三年的婚恋关系彻底结束，作为感情结晶的三个孩子全部由郁达夫负责抚养。郁达夫留在南洋继续其《星洲日报》文学副刊主编及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则回到重庆另选夫婿并成婚生子。

二

郁、王二人之间这场始于热烈终于冷漠的婚姻自然主要应归咎于后者的红杏出墙。另外，郁达夫的居无定所、经常性离家外出，尤其是 1936 年一度赴福建任职也为王的出轨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于曾热切追求的女人的背叛，深受中国传统婚恋观念影响的郁达夫自然很难做到既往不咎。但对于这段感情的性质及与王结合的选择正确与否，郁达夫之前并不是没有思考过。《日记九种》对于他们之间的相遇、郁对于王的苦苦追求至确定关系和在西湖边成婚的过程皆有详细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出，郁对王一见钟情的原因自然是喜欢她的青春靓丽，但潜在的原因却是出于他排遣独自一人在上海闯荡的孤寂。讽刺的是，当他开始时追求王而不得并为此沮丧的时候，他居然想到了远在北京的妻子孙荃及他已夭折的长子龙儿和次子熊儿，并为一个月来没有想念关心过他们而自我悔恨：

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 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日记九种》于 1928 年 9 月 1 日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一个半月之后，《真善美》杂志上便刊发了师鸿《书报映象·日记九种》的评论文章。其中提到：“《日记九种》或者可以算是郁达夫先生……颓废生涯的实

供，是他愤怒社会、怨恨政治的宣泄，是他与王女士恋爱时心理上……的实录。”的确，除了与王的恋情作为贯穿的主线之外，《日记九种》中还有很多作者关于当时时局的愤怒和对反动军阀残杀百姓的记录等内容。但笔者以为，假如妻子孙荃及孩子们当时都在上海陪伴其身的话，他与王的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正是这种正常家庭生活和亲情的缺失使得备感孤寂的郁达夫决心去重新寻找一份感情。像其早期小说中的很多男主人公一样，1927年上半年的郁达夫经常感叹于自己的“一生孤冷”，不满意于长期的漂泊生活和中国的混乱的时局。因为年初发表的《广州事情》一文，还遭到好友郭沫若和成仿吾的责难，在极端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他甚至冒出过自杀的念头。此时的郁达夫31周岁未及，但毕竟是已有家室的男子。自认为已到人生中年的他在追求其他女性的同时，也会时不时地想起身在北京的妻子儿女。虽然也属于包办婚姻，郁达夫与孙荃之间的感情基础还是不错的。在当年6月与王结婚之前，他和孙荃虽然经常分居两地，但夫妻间的书信往来一直都是保持的。在一起生活时，孙荃对郁达夫的照顾常体贴入微。在1924年28周岁生日的当天，郁达夫因妻子不在身边曾感伤地在《十一月初三》中写下下面一段话：

……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个黄昏时候，若是我的女人在我的边上，那么我所爱吃的几碗菜，和我所爱喝的那一种酒，一定会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摆在我的面前……一边她若知道我的烟又快完了，那么必要暗暗里托我所信用的年老的女底下人去买一罐我所爱吸的烟来，不声不响地搁在我的手头……

而在1927年1月27、28日的日记中，他提到友人周静豪的夫人听说其因追求王而不得的郁闷心情后，想为他介绍一位寡居的女士叫子音的做朋友。在将王与这位陈太太做了比较之后，郁达夫认为：“陈太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初追求王映霞的过程中，他是有过犹豫的。当时郁达夫面临的感情困扰是，在没有告知原配夫人的情况下从上海的这两个女子之间做出决断——如果后来王真的拒绝了他的话，他很

可能就会选择与那位善解人意的子音女士在一起。

作为明媒正娶的妻子，当时尚蒙在鼓里的孙荃自然会十分关心自己独自在外的丈夫，会经常性地从北京寄去报告家中孩子情况并嘘寒问暖的家书。例如在遇见王整整一个月之后的2月15日，他同时收到了孙荃和王的信件——“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后者也比以前不同了，稍稍露了一点诚意。”看来，邂逅之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王一直都在“试炼”郁达夫的诚意并因其已有家室而犹豫不决。而当时上海的背景是，反动军阀对罢工罢市的民众大肆屠杀，甚至连无辜的小孩及妇人都遭到杀戮；人头人体暴露在街道上，“路过之人，有嗟叹一声的，也立刻被杀。……男子之服西服及学生服者，也不知被杀了多少”。以至于“中国地界无头的死尸，到处皆是，白昼行人稀少，店铺都关了门”。

三

通过对郁达夫日记的考察，可以发现王对他的考察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节点。例如，在他们首次相遇后的第四十天，王主动写信与其约会；而到了第五十天的时候，王开始投入他的怀抱。至第五十二天的时候，王始允许郁达夫与其亲嘴。在当天的日记中，郁有如下记述：

又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允我Kiss的第一日。

在追求王映霞的日子里，郁达夫显然是几近痴狂的。这也是很多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都经历过的状态。郁更是把王映霞视作自己的救赎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彩，以为捕获了她的芳心之后自己这辈子就可以心安了。当恋情有了一半成功的把握时，郁达夫便体会到了“胜利者的快感，成功的时候的愉悦”，以至于在马路上再看到昔日心仪的“粉绿的卖妇”时，对于她们本会有的好奇心和探险心已完全被对于王的炽热感情净化了。然而，对于抛弃原配而追求新欢一事是否正确，郁达夫内心中也是经常权衡，尤其是在进展不顺的时候。有一次王无意中从郁的日记里看到后者对其追求期间的真实记述后，便对郁大发脾气。郁感

到非常委屈，认为那些文字不过是自己情感历程的真实记述。面对王的责难，郁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甚至流露出一不惜为情自尽的念头。而在前一个月，当王开始答应与其约会时，他已在日记中担忧过这段恋情的前景和结果：

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命运，终要来诅咒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对于他们之间的恋爱至结合，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是一段美丽的错误。1947年2月26日，出版于广东中山的《建中日报》上曾有一篇《记郁达夫》的短文。文中曾断言：“提起郁达夫之死，虽说是由于残暴的敌人所杀，然而追本溯源，这原因还是在乎从上海迁家到杭州……所以，他的生命，还是为这‘茅庐’所害哩！”“茅庐”自然指的是由王映霞主导建造的“风雨茅庐”，没有与王的相遇和结合，他就不会迁家杭州，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一“茅庐”，看来该文的作者是明显把郁达夫的死归因于其与王的恶缘。高旭东也认为，“事实上郁达夫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离弃发妻而与王映霞再婚。”而在1927年5月5日的日记中，郁达夫总结自己的这个春季时（后一天就是立夏节气），说了下面几句话：

……可怜可叹。叹我一春无事为花忙，然而这花究竟不能够如我的理想，一直的浓艳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因为陪护名花，要具有大力，我只觉得自家的力量还有点不够。

一春无事为花忙，显然是指费尽心思追求王映霞这件事。他此时显然已经意识到，王之所以在经过认真的考量之后答应委身于他，主要是因为自己作为名作家的身份。因为《沉沦》小说集及《茫茫夜》及《广州事情》等文章的发表，当时的郁达夫显然已跻身于中国文化名流之列。然而，虽然名声在外，郁达夫知道知道自己仍然还只是一介书生、“一种穷文士”，无钱无权无势。而王映霞这样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女性更渴望得到的显然是权势人物或富家子弟的陪护。郁在初遇王时是真的喜欢她，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去

追求。把自己已有家室和家人、朋友极力反对的现实统统置之不顾。而后者出于种种利弊权衡，最后选择了接受。这其中或许有爱的因素，但显然也无法排除一些功利的成分，例如通过郁达夫名作家的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快速跻身沪杭的社交圈并在将来为自己尚且年幼的两个弟弟安排工作等。如果最初的动机并非出于纯粹的爱情，那么日后的分手也就非常可以理解了。然而，在这场持续了13年的婚姻中，大多数时间里郁对王都是充满感情的，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段婚姻的结束自然主要起因于王的“红杏出墙”，但郁达夫本人也应负有若干责任。例如他先是只身赴福州做福建省政府参议，很长一段时间独自在外；后又去武汉任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赴台儿庄等抗战前线劳军等。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长期的两地分居显然让负责照管几个孩子的王映霞缺少人身、情感和经济方面的多重安全感，并逐渐对丈夫的不为自己和家庭考虑心生怨恨。既然缘分已尽，选择放手对彼此也都是一种最好的结果。但从早期的《日记九种》和后来郁达夫在外地给王映霞写的很多书信来看，郁对王的感情一直都是非常真挚的，直至1938年5月的《大公报》“启事”事件之前都是如此。他们最初在上海滩的缠绵爱情也羡煞旁人，难怪柳亚子就曾说过他们两人是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了。

四

与王映霞成婚之后，郁达夫与原配的关系并没有马上断绝。王婚前要求他与孙荃离婚的事情不了了之。然而，翻读郁达夫的日记可知，在1927年的6月16之后，原配夫人孙荃几乎就再没有在他的日记里出现过。当日他收到了她自北京寄去的信——此时的孙荃对于郁、王的恋情和婚事毫不知情，尚在信中对郁的病状表示出担心。而他在前一日给孙荃寄往北京的信件，可能也是他对于原配夫人的最后一次温存。显然，在他与王映霞之间看似浪漫的恋情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无疑是孙荃及其一直在抚养的三个子女。

因为新欢而抛弃旧爱的故事古今中外都不鲜见。郁达夫对于孙荃的离弃，最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无非是他们两人不是自由恋爱，后者也不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妻子，没有共同语言等。然而，这并非都是真实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初期，他曾“将孙荃视为

可以在险恶人世中倾诉衷肠的知己”，“而对诗歌创作的共同爱好更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中感情联系的重要的纽带”。何况，在对人生和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时，郁达夫还以与妻信的方式给孙荃写过那篇著名的《莛萝行》。因此，在得知昔日相知丈夫的突然另寻喜欢，孙荃无疑会非常震惊、生气和伤心。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发表，已向世人宣告了她此时已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弃妇。但事已至此，再多的郁愤都终将无益。生活还要继续，三个孩子还需要她来抚养长大。从此意义上说，郁达夫的确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与王结合之后，他对于与孙荃生的三个子女的感情慢慢淡化直至冷漠。除去每月由王映霞负责寄出一些生活费给孙荃和子女之外，他几乎没有尽到过其他身为父亲所应担负的任何责任。而从1932年10月寄给王的几封私信中，我们更是可以发现郁达夫人生中少有的可憎的一面。当时的郁达夫正在杭州“静养沉痾，细写东西”，而王映霞与孩子则住在上海。有一次郁在去浙江图书馆看书的路上，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妇人，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性青年和一个孩子。他误以为是其原配夫人孙荃，还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与王结合后，孙也找了一个异性伙伴以作报复和慰藉。更可恶的是，他居然在给王的信中称其原配为“泼妇孙氏”，并告诉王他们以后应迁居到不易被孙荃找到的“他省之交通不甚便利”之处。在两天后的信中，他又告诉王自己对于原配“早已无感情之可言”，“而她去弄一个年轻男子陪陪也是应有的事情”。对于与原配所生的几个子女，他也大有撒手不再管的意思；说对于儿女自己一向就看得很淡，“从此撒手，也正是好时机也”，要求王不要寄钱给富阳的孙荃及其子女。而在前几天的信件中，他已对王说过同样的话——“富阳请勿寄（钱过去），当积至过年再说”。在接下来几天的信件中，郁再次告诉王：

富阳泼妇若有信来，你可要不要开封，马上写一附笺，送回原处，说收信人不在好了。以后绝对可以不去理她。

但极具嘲讽意味的是，他所提到的街头看到“泼妇”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过是其自身的心虚和负疚心在作怪罢了——他远距离看到的妇人并非孙荃，那

孩子自然也不是他们的次子熊儿。后来他二哥的来信确证那天孙荃及儿子根本没有离开过富阳。郁达夫对于朋友大都推心置腹，真诚而坦率。他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和政治的态度及其爱国主义精神也都是值得赞赏的，人生中几无败笔。但读到以上他对于原配夫人如此敌视和戒备的态度后未免令很多读者对其大失所望，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人性中少有的丑陋的一面。在新欢面前贬低原配本来就是不应该的，饱读诗书又长期留学东洋的他尤其不应有此作为。此外，对于自己的几个婚生子女也长期不管不问，甚至偶见一面时也没有流露出父亲与儿女间本应有的血缘亲情。这更是一个已经名声在外的中国文人雅士所尤不应为。他与王结合后，自然会与原配有不少的恩怨纠葛，但孙荃及其几个年幼的子女本身毫无过错可言，他们无疑都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合的最大受害者。

然而，在得知王映霞出轨许绍棣之前，郁达夫有没有对他们之间的这场婚姻后悔过？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早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前的九个月，他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件里曾用一小段文字专门提及自己的悔恨之意；说自己“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 Verlaine 的晚年”。并解释说虽然自己的才能无法跟魏尔伦相比，但自己婚内恋爱的事情却与其和兰波的邂逅非常相像。郁达夫还提到，自己并非没有想过与王结束关系的事情，“但是责任感”，又使其不能断然下此决心。他认为自己几年来的无心创作和从事其他文学上的事情，都是为与王的婚恋及家庭问题所累。最后他感叹道：

……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

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 irony。

夫妻间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出现一些意见不合实属在所难免，“而一旦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那将是永远无法弥合的”。而对于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人意识的郁达夫来说，王映霞的身心背叛无疑是令他无法接受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在香港的报刊上公开发表《毁家诗纪》并在汉口《大公报》上将王出轨的事情公之于世的部分原因。虽然出于为几个未成年孩子考

虑的因素，他们的婚姻关系维持到1940年年初，但最后的完全断绝早已在所难免。因为郁达夫是一个一旦做出决定就绝不会再回头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亦是其性格中的部分固有因素。这从他1938年5月回击当时已倒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昔日友人佐藤春夫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

笔者认为，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姻存续期间之所以曾冷漠地对待原配及其几个子女，自然与其当时经济上的窘迫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成长经历中自身性格的某些缺陷。他三岁时便丧父，之后寡居的母亲则一直忙于经营家中田产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无暇照管他。可以说幼年时的郁达夫在父爱和母爱两方面皆有极大的缺失。留学归来后，他因母亲刻薄对待自己及其与孙荃子女的事情，母子间的关系也一直不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是他对于婚姻家庭并不十分看重的部分原因。当然，他与王映霞结合之后家庭经济状况的经常性捉襟见肘也是其冷待原配及其子女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我们今日在纪念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爱国主义政论家和革命烈士的同时，也应了解他曾有过的一段置旧情与亲生骨肉于不顾的自私冷漠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郁达夫一生中很大的一个缺憾和令广大喜欢他的读者很难接受之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部分论著从女性主义

与婚姻关系的角度研究郁达夫的女性观，这也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但由于本文视域有限，仅对相关直接文献与其部分日记中的文字做了分析阐述，力求直接勾勒其生活与创作的关联与轮廓。对于郁达夫一生婚恋中的全部问题本文不能一一论及，但笔者是完全尊重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是必须说明的一点。

参考文献

- [1] 陈子善. 说郁达夫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0.
- [2] 陈子善, 王自立. 郁达夫研究资料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 [3] 黄世忠. 王映霞: 关于郁达夫的心声 [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
- [4] 李杭春, 郁峻峰. 郁达夫年谱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5] 刘涛, 沈小惠. 郁达夫新加坡文集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 [6] 孙百刚. 郁达夫外传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 [7] 王映霞. 王映霞自传 [M]. 黄山: 黄山书社, 2008.
- [8] 许凤才. 春与秋的故事: 郁达夫爱情志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9] 郁达夫. 郁达夫全集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曾华鹏, 范伯群. 郁达夫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The Passionate Was Annoyed by the Ruthless

——On the Entanglement of Yu Dafu's Two Marriages

Shen Xiaohui Gao Zhaocheng

Abstract: Yu Dafu didn't have a thorough marriage either with his first wife Sun Quan or with his second wife Wang Yingxia. It was Yu who was weak-willed and at fault when he abandoned the Former and went to look for his new lover. Firstly, Yu felt guilty to Sun and her kids during his pursuit of Wang. However, with the time passed, his guilt gradually diminish and almost disappeared completely.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his marriage with his second wife, it was mainly because of Wang's unfaithfulness. Therefore Yu's second marriage was proved to be a beautiful mistake in the end.

Key words: Yu Dafu; *Diaries of Nine Kinds*; Sun Quan; Wang Yingxia; love and marriage